

修订合编本

4

湖南文史

资料选辑

1964 1965

8、9月号

合计合编

第 **4** 集
修订合编本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长沙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修订合编本)

第四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徐日晖

装帧设计：张小平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17,000 印张：14 印数：1—3,400本

统一书号：11109·207 定价：1.65元

(内部发行)

yt260/03

重 印 说 明

一九六一年十月,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开始编印《文史资料》(自第四辑起,易名《湖南文史资料》),至“文化大革命”前共编辑出版九辑。由于每辑印数很少,又经十年动乱,这些选辑现在均不易找到了。为供广大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研究近、现代史的需要,特修订重印,每两辑或三辑合订一集,分四集出版,改名《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此次重印,删去了个别史实有出入的文章和附载的文件。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六月

目 录

第 八 辑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	程 潜 (1)
关于汤芑铭在湘暴行的回忆(座谈访问记录)	(39)
护国运动见闻杂忆	黄一欧 (74)
傅良佐督湘的片断见闻	戴 岳 (106)
驱逐傅(良佐)、张(敬尧)回忆	左霖苍 (114)
谭延闿联吴(佩孚)驱张(敬尧)的鳞爪	萧仲祁 (117)
护法时期的湘西动向	杨思义 (122)
廖湘芸烟溪起事纪略	萧石朋 (136)
北洋军阀统治湖南时期见闻琐记	荆嗣佑 (141)
戊午株洲兵祸记	叶镜吾 (150)
岳阳兵祸目击记	龙文蔚 (166)
我们所知道的刘重	李 铨 刘赞廷 (169)
刘建藩事迹回忆	黄一欧 (176)
大劣绅叶德辉	文干之 (189)
黄克强先生甲辰避难西园事略	龙绂瑞 (211)
记湖南铁路学堂	龙毓峻 龚业强 (213)
众议院十二年亲历记	陈九韶 (216)

神州学会和东亚同盟会 申悦庐 (241)

第九辑

湖田洲土史话 萧训 文斌 李震一 (247)

解放前湖南纸币之祸 李维城 (265)

湖南鼓铸和使用铜元纪略 赵 恒 (279)

复兴银行始末 冯 器 (282)

我所了解的湖南实业银行 金贡安 (303)

关于瑶冈仙钨矿的回忆 凌霞新 (311)

湖南民营航业五十年 彭六安 (325)

湘绣发展史略 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 (343)

三百年老店——劳九芝堂药铺

..... 湖南省
长沙市 民建、工商联史料工作组 (370)

我所知道的安江纱厂的黑幕 曾诚意 (390)

英美烟公司在湖南的掠夺 王天璞 汤佛森 (396)

美孚石油公司在湖南的经济侵略 王国凯 (408)

帝国主义在湖南内河的罪行一斑 范德发 (413)

质疑·补充·订正

对《辛亥长沙光复的东鳞西爪》的补订 李鲁青 (417)

关于湖南陆军小学史料的补充和订正 周传铭 (418)

对《国民党苏浙皖边区挺进军总部见闻》

的订正 谭道平 (420)

柯远芬不是侍从室军事组长 曹鼎汉 (423)

对《湖南文史资料》第四辑订正二则 袁桓楚 (424)

关于鲁涤平主湘时间的订正 刘 莼 (425)

关于《何健联桂驱鲁和附蒋讨桂经过》的补充

- 订正……………魏 镇 (426)
- 对《马变后邵阳地区的大屠杀》的订正 ……段公爽 (431)
- 对《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的回忆》的订正 ……唐中和 (432)
- 关于李唐事迹的补充 ……黄宗楠 (435)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

程 潜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准备工作

在袁世凯酝酿帝制的时候，中国国民党的主要人物，都冲破了袁世凯的通缉罗网，作为政治亡命者侨集于日本东京。这时，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定名称为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在新党尚未宣布成立时，就以青帮首领身份窃据组织部门要津。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在此时期，孙中山先生曾派居正、覃振对我们说明入党必须捺指印的意义，希望我们尽弃前嫌，参加中华革命党，共同奋斗。我们表示对孙中山先生忠诚拥护，但不愿与帮会合作，现在即不入党，也不会另立名目，妨碍革命的进行，请居、覃将这层意思转陈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明白了我们的意旨，也没有勉强要我们加入中华革命党。

当时我们在东京有一部分同志，每星期都举行谈话会，分作四个题目，来研究国内情势和革命进行方针。第一、主义。我们认定，无论革命或建设，都必须有主义以为指导。如果没有主义，

*程潜先生写的《护国之役前后回忆》，已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发表，全文共计九节。这里选载的是第三至九节。

不但不能打倒袁世凯，就算打倒了袁世凯，也不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认为，三民主义较之西方的民主议会政党政治，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能把中国建设为富强之邦。第二、量敌。我们认定，当前主要的敌人是万恶滔天的袁世凯，而袁世凯则有四种恶势力作为他的羽翼：一是北洋军队盘踞要津；二是反动官僚遍布全国；三是土豪恶霸横行乡里；四是会党游民弥漫当道。这四种恶势力长期以来流毒社会，鱼肉人民，我们和袁世凯作斗争，必须斩草除根，把这些恶势力消灭尽净。第三、党派。我们认定，进步党是一个政治危险性最大的政治集团。它是前清立宪派的化身，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所以甘为独裁者所笼络利用，拚命和国民党作对。袁世凯毁约法解散国会，把进步党抛在一边，但是这个投机取巧、复雨翻云的政治集团，只要有机可乘，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肆行争夺。因此在反袁斗争中，我们要注意进步党的动向。第四、宣传。我们认定，必须向全国广泛宣传，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才能取得反袁斗争的胜利。

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我们为了对世界大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详尽的探讨，组织了一个欧事研究会。为什么要取名为欧事研究会？对于这个名称，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下来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想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来可以避免发生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二来可以借此联络侨居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互相商榷；三来不怎么显眼，一时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联络，互通声气。

在欧事研究会成立之前，侨居日本的同志，如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等二十八人，曾联名发出了一个停止内争、一致对外的通电。在通电宣言上署名的，大体上就是后来欧

事研究会的成员。通电宣言是章士钊起草的(见《甲寅杂志》)，略谓：我们秉着爱国天良，反对独裁之志，始终不渝，即使在外患凭陵的时期，我们对袁世凯也不作丝毫让步，不存丝毫幻想；但我们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首先是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日益紧逼的侵略。这个通电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情，也招致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误解。自浅识者观之，以为我们声称停止内争，对袁世凯表白心迹，一定有所企图。自袁世凯观之，我们的通电宣言，无异给他的通敌卖国、帝制自为，又增加了一层障碍。袁世凯痛恨之余，就贼喊捉贼地诬蔑我们，说我们是“借寇自重”。帝制运动公开化之后，欧事研究会的活动渐渐及于国内，成为反对帝制的一种势力。

在成立欧事研究会的同时，我们还积极筹划倒袁。我们在东京看到日本报纸关于袁氏进行帝制运动的新闻报道，比国内的报纸更为明朗具体。我们分析了国内形势：自1913年讨袁失败后，中国三大流域的各省，都已被袁世凯千方百计地派遣爪牙盘踞，只有长江上游西南一隅，袁世凯因鞭长莫及和兵力有限，尚未吞噬。虽然袁氏派陈宦率北洋军入川接管了川政，但大西南的云南，仍是袁氏力所不及的地方，可以作为反袁起事的基地。我们认为云南有四个优越条件：(1) 地处偏僻险阻的边区，在军事上扼险要优胜之势；且四川地方军队既杂又乱，陈宦一时统一不起来，可以作为云南的有力屏障。(2) 云南两师陆军的素质，大大超过北洋军队，所有中下级军官，都是讲武堂的学生，学术优良，思想纯正。云南讲武堂是李根源筹办的，他曾邀集同学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等，参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教程，结合中国实际所需要的革命精神，认真训练和教育学生，因此造就了不少革命人才。(3) 云南陆军所使用的军械，都是德国克虏伯厂的精良产品，是

在清末以重价从德国购来的，其枪炮火力之强，超过南方各省的军队。(4) 云南当时的几个主要当权人物，如唐继尧、罗佩金、殷承瓛、叶荃等，原来都是同盟会员或者有革命倾向的人。因此，如果袁氏称帝，我们可以成功地在云南组织起义，为全国倡。但是，我们也预见到，即使把袁世凯打倒了，袁氏的党羽还要继续和我们作斗争；跟我们同声讨袁的队伍，将因政见的不同而发生分化，其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力量，也还要继续和我们作斗争。而我们内部的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的，章士钊的调和论，未必可行于中国，我和李根源对此也常有辩驳。总之，这一时期，我们一方面兴奋激动，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则是瞻望前途，忧心忡忡。

这年8月，正是袁世凯筹备帝制紧张的时候。在北京，以筹安会为核心的一批人物，按照计划，纷纷密电各地，如何组织国民代表团，如何指派劝进代表，如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闹得乌烟瘴气。我们在东京的欧事研究会也积极探讨策划，大家感到，云南方面虽然联络得极好，但能否毫无阻滞地进行发动，还是没有把握。这时王九龄从昆明来，告诉我们，自陈宦率军入川后，云南全省大为震动，人们知道云南已成为袁氏的眼中钉、俎上肉，危险万状，因此群情鼎沸，军队反袁的情绪更是继长增高。王九龄谈到的情况，和我们前此派人联系所得来的情况，有些出入，不能据此决定行动。由于方声涛和云南的中级军官谊属师生，有许多社会历史关系，进行工作诸多方便，因此我提议请方声涛亲自赴昆明一行，探明情况，进行联络，策动工作。大家同意这个提议，并且和方声涛约定了暗号，如联络策动有所进展，我们接信后就立刻回国共策进行。

在上海的策划活动

方声涛经上海、香港、越南，到达昆明。9月中旬，方从昆明来信称，“尚须多方调查”；10月初又来信称，“销路甚好”，10月10日来函，要我们速到上海面商。大家商量决定：我和李根源为欧事研究会的干事，应首先回国；其余同志，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陆续回国。我和李根源两人于11月3日由横滨坐邮船动身，两日多就到了上海。在船上遇见朱卓文，他把我们当作袁党，肆意谩骂一通，我们只好付之一笑。到上海后，我们受检查盘问比朱卓文还严，他这才恍然大悟。其实，我们这次能够闯过检查关，也确实有些侥幸，因为李根源那副尊容，是最易被人发现识破的。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法租界宝康里，方声涛则已于先一日返沪。他说：云南的两师陆军，团、营级的主要骨干，如邓泰中、杨葵、刘云峰、华封歌、董鸿勋、黄永社、赵钟奇等四十余人，都极端反袁，久已跃跃欲试。他们对蔡松坡的情谊很深，听说蔡在京的寓处被搜，情绪十分激昂，并已秘密派人赴京，欢迎蔡离京回滇主持大计。我们听到方声涛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通知张孝准，要他积极与蔡联系，掩护蔡出京。此时，和云南关系极深的李烈钧，也从香港派人到云南联系策动。不数日，章士钊、耿毅、冷遹、程子楷等，都先后从日本回到上海。此时袁氏叛国称帝，人心丧尽，上海社会舆论反袁的情绪，已达极点。我们这些人先后聚集上海活动，虽然袁世凯的密探爪牙遍布上海，亟欲加害，但他们害怕强大的群众舆论压力，也不敢肆意下手。后来陈其美回上海和我们联系，并保证我们在上海行动的安全，我们也表示愿意和他合作，共同奋斗。

我们的发难基地和发难主力，自然专恃云南。但是我们必须

在全国广大地区及早发动讨袁力量，发挥互相策应的作用。这一点，是在我们归国之后才逐渐想到的。我和李根源等商妥，重新规定行动方针：（1）全国各界人士，凡秉爱国热忱和救国愿望，挺身而出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者，我们都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2）国内平日与我们不同宗旨的党派，只要真心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我们也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3）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它方法。我们安排分配了一下各人的任务：耿毅担任北方同志的联络工作；熊克武回四川组织地方讨袁军，为云南主力军的向导；柏文蔚、钮永建、冷遹策划苏、皖、浙地方军队的发动；林虎担任广西的联络；李烈钧担任筹划粤赣军事；我和张孝准布置两湖军事及湘省义军的发动。并且相约：组织发动起来的力量有大有小，但是每个同志都必须努力去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在反袁战线上尽量发挥作用。此时，我们又筹组了《中华新报》，从事反袁宣传。

不久我们得到确实情报，张孝准和蔡松坡联系极好，蔡已安全离开北京。一天，我和章士钊往虹口访谭延闿，见面说了些应酬话，然后就把袁氏称帝的情形和全国反袁势力的壮大等形势告诉他，并且问他作何感想。谭说：“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应有的义举，我竭诚拥护，没有贰心。但是袁世凯掌握强大兵力，我们手无斧柯，这又有甚么办法呢？”章士钊很客气，让我说话。我说：“反对袁氏称帝，办法是有的。事在人为，人苟不为，纵有办法，也是枉然。凡事不能只看表面，要看得深一些，透一些。袁世凯掌握着北洋军队和官僚集团的势力，外表强大，但他是不得人心的，他内部又有众叛亲离的趋势，列强加诸袁氏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顺从民意，以民众的力量为后盾，只要一处发难，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袁世凯是可以打倒的。”谭延闿说：“你们回国活

动，是仅仅激于天良血性的义愤，还是有点实力做后盾呢？”章士钊说：“既有义愤，也有实力。袁氏集团分崩离析，死在眼前。我们名正言顺，诛暴伐罪，这个号称拥有实力的独夫，是抵挡不住的。当然，反袁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大家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困难才能克服。”谭唯唯诺诺，说什么来日方长，可以从缓计议，谈话就此结束。我对谭还存有争取的一线希望，过了几天，就着人送信给他，说有要事相商，请他约期相会，谭对我派去送信的人说，外边风声紧，要我们出入谨慎，并约了日期会晤。到了约定的日期，连人影子也找不到。第二天他打发人送来一信，说是“齿痛爽约，十分抱歉”。这天晚上我凑巧遇见黄梅生。黄告诉我，头一天他还和谭在小有天中餐，谭喝得酩酊大醉。我这才明白，谭怕革命不成，累及己身，所以用虚诈敷衍手段来应酬我们，我们也因之对他产生厌恶绝交之心。过不了几天，我于上午10时在霞飞路步行，谭在马车上发现了我，立刻下车，装出很亲热的样子，问我上什么地方去。我一本正经地说：“到同志处商谈要事。”谭说：“我是特地来拜访你的。”我说：“改日会罢！今天实在没有空。”谭说：“我到你的寓处等你回来。”我到圣母院路章寓谈话一个钟头，赶回接待谭延闿。此人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些革命形势，我留他午餐之后分手。

为了策动两湖的反袁力量，我趁在沪方便，进行了一些人事上的联系。上段提到的黄梅生，本是同学黄恺元的兄长，他在上海经营商业多年，夙著信用，两湖的革命同志大多跟他相识。有一次他在寓设宴招待我，谈话间表示近来营业兴旺，颇有盈余。我说：“现在手边拮据，筹款很是为难。”黄梅生说：“你们的困难我深为了解，需要用多少钱，我可以尽力贷垫。”我说：“多多益善，但眼前急需动用的却不多，而且应该不妨碍你的生意才好。”黄梅生当即

爽快答应，需款时他能随时垫付。我们在困顿中得此帮助，实不容易。我这时考虑，湖南同志中，冲锋陷阵、披坚执锐的人才是不少的，就是运筹帷幄、全盘指挥的领导艺术稍微差一些。我在癸丑讨袁之役中，认识了杨王鹏、廖湘芸两人，他们是蒋翊武的战友，辛亥年曾一同组织过武昌军队起义，有比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和李国柱、邹永成、龚铁铮、殷之辂、刘白等组织民义社，是中华革命党的一部分，但和陈其美一派有矛盾，不肯和后者同流合污。我约杨王鹏、廖湘芸谈过两次话。我心里明白，要他们一下子完全听我的话是不太可能的，但大敌当前，正义所在，争取他们合作，也还是办得到的。我和他们作第三次谈话时，袁氏帝制运动正万分紧张地进行，他们情绪激昂，表示愿出死力拥护共和，打倒帝制。我说：“你们的斗志坚决真诚，这是很好的。但我知道，你们从前所组织的炸弹队和暗杀队，在武汉、九江、扬州等处都遭到过失败，现在应该中止这种恐怖行动才好。”杨王鹏说：“请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们到底坚持什么主义？”我说：“我们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至死不渝，不能节外生枝，立异标新。比方说，三民主义是海，我们和黄克强只能算是百川，而百川终汇于海。但是百川里面有一股浊流，孙中山无法澄清，我们也无法澄清，在一定时期之内，只好潜行不悖，相安无事。倒袁是我们目前的紧迫任务。袁氏虽然众叛亲离，成为全国民众的公敌，但毕竟不是赤手空拳可以吓倒的，也不是策动一部分军队、联络一批会党、占领一个据点，就能够把袁世凯打倒。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运用一个基本力量，建立根据地，影响各省，策动有倒袁倾向的军队。这样，袁氏在各省部署的暴力就会如汤沃雪，尽归消灭。你们回湖南去，又预备如何着手进行呢？”杨王鹏说：“先在长沙、衡阳策动军队，树立义旗。”我说：“这是辛亥年 3

月29日黄克强进攻广州督署的复版。那次黄花岗之役，震动全国人心，为武昌首义之先导。但今非昔比，袁世凯更不同于清朝。长沙、衡阳是冲要地区，袁氏已布重兵，即令得到少数军队的赞助，发难侥幸成功，但离根据地过远，势难长久坚持。我的意见，应该从湘西宝庆边远地方着手，组织队伍，作为根据，等云贵军队出兵湘西，或者那时我由云南带领一部分军队回来会师，一同奋斗，才能恢复湖南。如果不按这个办法行事，冒险妄动，一定会遭到重大损失。”杨王鹏、廖湘芸满口表示愿意接受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们，他们在上海的费用和回湘旅费，我可以尽力支援。

当我布置湘事的时候，耿毅介绍袁乃宽之子袁不同和我见面，我问他袁氏称帝进行的情况，袁不同说：“一般走狗，不顾百姓死活，疯狂地忙着筹备大典，已定明年元旦唱大登殿。我情急万分，希望有人起义讨逆，我也可以从中做点小玩意儿给大家看看。”我说：“如果你能这样做，就是古人所谓大义灭亲了。请你与鹤生密商办理，我们坐听好音。”由此可见，袁氏的滔天罪行，不仅为国人所共弃，抑且为宗族所不容。

有一天，章士钊告诉我，他想款待一下梁启超，请我作陪。我说：“在反袁不分党派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奉陪，听听他的议论。”12月19日晚，章设宴款待梁氏，我于6时先到章寓，梁启超随后也到了。泛泛应酬之后，我对梁启超说：“拜读了你的近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非常钦佩。”梁启超说：“我煞费苦心，改稿多次，现在发表的文章，较之原稿，倒是温和得多了。因为我不想牵累同党，所以发表文章，宁愿脱党。”梁启超接着又发表了一大套反对袁氏称帝的言论。我说：“倒袁是不成问题的。重要的是，倒袁之后，应该有一个主义为建设国家之准绳，对袁氏所遗留的北洋军队要迅速收拾。这倒是两个极关重要的问题。”梁启超说：

“现在不好刻舟求剑，因为剑虽沉沦在此地，舟是随时移动的，将来只好就事办事。”我因为此人善变，这次反袁的思想动机也不纯正，不好再作深谈。梁启超接着又替蔡松坡吹嘘了一大通。章士钊说：“大家都是相知有素的老朋友了。我们确信松坡是玉碎而白不移、金销而刚不易的好汉。”到此宾主尽欢而散。

由沪去滇及在滇的活动

我们从东京方面得到确实消息，蔡松坡能于12月20日以前抵达昆明，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在此之前必定到达，云南方面大约一星期之内即可举事发难。此时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虽然遇到国内外的同声反对，袁氏集团内部也意志行动不一，但筹安会和各省劝进团的猴子戏还是在积极串演，计划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于1月1日登极。我考虑袁世凯帝制自为势在必行，因与李根源转赴香港，以便对广西作进一步的策动。

我们于12月21日乘邮船离开上海，23日抵香港，寄住跑马地。当晚，我们得悉：蔡松坡于12月19日到滇，23日即以唐继尧、任可澄的名义致电北京，对袁下最后通牒，令袁立即取消帝制，立诛祸首杨度等十三人，并限于24日午前10时答复。届时不得答复，便于次日宣告独立。

1915年12月25日，云南省宣布独立，唐继尧、蔡松坡通电正式讨袁，组织护国军。众推唐继尧为都督，任留守；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第一军出四川，第二军出两广，第三军为总预备军。

袁世凯对云南一隅发难，虽想采取迅速手段予以扑灭，但究竟路远阻隔，力不从心；且五国曾对袁氏提出缓行帝制的警告，现